

伍云南：风云百变客 恰是弄潮人



人物春秋

好好的学校教员不当，拿起枪打起了游击；三年后又重回学堂，学起无线电发起了电报；七年后已成为无线电专家的他，却又奔赴西安做起了办事处的联络工作。每一次，他总能出色完成好党组织安排的“跨界”任务。他，就是伍云南。

秀才造反，教员拉起游击队

伍云南从小读书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20年考上湖南25县招生，每县仅录取4名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全家人高兴地期待他将来能够“学而优则仕”，改变家庭窘境。然而，伍云南受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早已在思考民族前途、探求真理。

1922年，毛泽东来到衡阳向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演讲，伍云南现场聆听后感慨，这一次的演讲“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启蒙和教诲”。1926年，毕业后的伍云南在耒阳县立初中任教，于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听从组织安排，伍云南毅然辞去安定的教员工作，先后担任耒阳县总工会

伍云南（资料图片）

伍云南，湖南耒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1930年参加“中央特科”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机务技术，1931年调中央苏区参与组建红军无线电通讯大队。长征途中，为保障我军无线电通讯联络做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行政处处长、中央工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兼党组书记、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务处处长、湖南农民协会驻耒阳县农运特派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伍云南又“弃笔从戎”，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后，伍云南在耒阳将区乡的党组织恢复建立，同时成立游击队，准备响应秋收起义；1928年湘南起义爆发后，敌军占领耒阳县城，红军由城北突击敌人，伍云南动员组织数千人的农民武装配合，击溃了敌人。

半路出家，门外汉成通讯专家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斗争日益严酷，中共中央迫切需要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共产国际等加强联系，急需建立地下无线电台和无线电通信网络。

1930年，伍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参加我党秘密设立的无线电训练班，毫无基础的他开始学习无线电机务和收发报技术。当时的培训，一无安全保障，随时提防军警特务的监视、逮捕；二无后勤保障，培训学员每天都是买一把小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食物；三少学习用具，伍云南与曾三同住一起，两人的学习工具就只有一个电键、一个蜂鸣器和一块干电池，再加上几张纸和铅笔。他俩轮流一个发、一个收，在单调枯燥的“滴滴答答”声中日复一日地训练。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伍云南快速掌握了无线电技术，4个月后，他的收抄能力已达到

每分钟110—120字。

1931年，受党组织派遣，伍云南与涂作潮、曾三等一同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此后，他参与创造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的许多“第一”：组建了第一支红军无线电通讯大队，第一次实现了红军内部电台之间的联系，第一次完成了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电台的直接通讯任务，建立了第一个红军无线电通讯学校……1933年，中央苏区学习掌握无线电技术的学员已扩大到1000多人，并还成立了专门保管、修理、购置器材和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

随着我党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一条条看不见的电波在战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反“围剿”及长征途中，伍云南等不仅担负着中央红军内部及与其他红军队伍的通信联络工作，同时还每天对周围敌军电台通信开展侦听，为指挥部作战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情报，帮助红军在湘、贵、云、川地区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急中生智，国统区巧使“金蝉脱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伍云南被毛泽东点名出任办事处处长，由此来到西安。西安既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也是

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驻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担负着与国民党的联络交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送各地往来延安人员、为抗日前线和陕甘宁边区采购输送物资、掩护和联络地下党组织等重要任务。这些工作需要与各行各业、各路人马打交道，需要公开与秘密相结合，非常考验政治定力和工作能力。

伍云南迅速进入角色，与时任中共驻陕党代表林伯渠搭档，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有一天，伍云南突然接到通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投敌叛变，党中央决定将洛阳办事处的人员、物资紧急撤回西安。孰料国民党特务也获悉了这一消息，立即安排大批人员埋伏在西安火车站，准备将我军撤退人员和物资“一网打尽”。

眼看从洛阳到西安的车只有一站路程了，列车却突然在灞桥站停了车，司机对列车长说：“列车坏了，要修理。”说罢便拆修起来。此时，最后一列车厢的车门悄悄打开，几十名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军人从列车上走下来，迅速通过西安东门城楼，最后进入了八路军办事处。

40分钟后，列车到达西安站时，国民党的军警、特务蜂拥而上，但却扑了个空。原来，伍云南提前获悉了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情报，通过地下党的工作关系，临时改变了停车计划，安全完成了撤退任务。 □魏安仁

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

往事

到陕西考察或游览，看周秦汉唐的珍贵文物，乃常规定动作，大概所有人都这么做。但作为非本专业的“专家”，此前我多次访陕，除了观赏十三朝古都的众多宝物，还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易俗社剧场、西安事变旧址、户县农民画、党家村古建筑群等。这次的观察，依旧别有洞天——主要着眼点不在帝王风物，而是大学历史。

将近一百年前，鲁迅来西安讲学（1924年），那时陕西的高等教育还相当落后，这既是政治经济的体现，也是文化学术的折射。1924年的七八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来西安讲学。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做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以为鲁迅能写长篇小说而争论不休。后世的众说纷纭，大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

今天陕西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博物馆建设，得益于中外学界的通力合作，但本地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前几年教育部公布第四轮学科评估，考古学科并列第一的是北京大学与西北大学——后者乃陕西文科唯一的A+，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绩。

不仅仅是考古学，经由抗战西迁、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如今的陕西，已演进成高教强省。

几年前我曾撰文，谈及经由985、211等工程，中国大学两极分化，“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这次陕西采风，我联系了宝鸡文理学院及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为这两所大学各做一专题讲座（前者临时添加一场师生座谈会）。

北大侧影

我不是校史专家，但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谈北大，或者说“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是我的学术兴趣之一。

多年前，为《鲤鱼洲纪事》撰写题为《回首烟波浩渺处》的前言，提及北大档案及出版物中涉及“鲤鱼洲”故事时，也有“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或“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的提法，但我主张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1969年10月，北大前往江西鲤鱼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职工及家属；去陕西汉中的1247人，其中教职员工440人，学生807人（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第6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北大汉中大分校——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与鲤鱼洲的“草棚大学”不可同日而语。1964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北大开始在陕西觅址建分



西北联大法学院旧址。

校，最后敲定了汉中秦岭南麓。第二年8月，“653”工程破土动工。1966年，北大力学系、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一年级（65级）学生及授课教师来到653工地，边劳动边学习；1969年因国际形势紧张，此三系大部分师生疏散到已基本建成的汉中大分校，开始正式的教学与科研。1978年4月，中央批准北大迁回，第二年完成移交，校舍及部分教职员并入新筹建的陕西工学院（日后与汉中师范学院合并，组成今天的陕西理工大学）。据《情系“653”——北京大学汉中大分校纪事》（虎桥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记载，在北大汉中大分校工作和学习的师生，日后成为院士的有胡济民等十位，先后出任北大校长的周培源和陈佳洱，此外还有三名副校长，可谓人才济济（第3页）。在这册公开刊行的北大汉中大分校纪事中，我最喜欢的是后来任北大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的《褒水连城的记忆》以及钟云霄的《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前者从最初陪周培源前来选址，一直讲到：“1979年春节后，我将该交代的都交给了前来接管的陕西工学院代表，然后，怀着依依不舍和深深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青山绿水、遍地黄花的汉中，告别了曾经付出了十年心血的‘653’，告别了褒水、连城！”（第50—55页）后文作者随夫君胡济民在鲤鱼洲劳动两年，好不容易搬到农场撤销回北京，“但技术物理系已经到了汉中，我们也来到了汉中”。此文有很多精彩的细节，尤其是结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任何地方（‘653’人很多都老了，因此常常是在校医院里），偶尔两个人碰见了，就会出现这样情景：‘啊！你去过653？’‘是啊！你也去过？’‘是啊！是啊！’两个人好像是他乡遇故知似的，握手畅谈起来。”我未曾目睹此类情景，但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有此因缘，北大人对陕西理工大学另眼相看，时常接受教师进修，或派人前来讲学。但这种感情，主要体现在理科院系，人文学者极少关注。我因关注校史，深知道路曲折与前辈艰辛，故特地前来采访。那天，在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原北大汉中大分校旧址、现陕西理工大学北校区。刚进校门，迎面就是周培源塑像和他1988年题写的“陕南学府，士子向往；精心培

养，国家栋梁”诗碑，当然要下车拍照了。众多灰砖建造的四五层宿舍楼，很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北大校园。正对着大道的办公楼，如今是理科实验楼；穿过楼道，上几级台阶，就来到跟北大一模一样的阶梯教室。教室里正上课，主人指着墙上那块上书“西联”二字的蓝色牌子，告知那是北大

旧物。大道两旁众多苍翠的雪松，一旦大雪纷飞，当年的北大必定“且认他乡作故乡”。参访北大汉中大分校，在我计划之中；拜谒三沈纪念馆，则完全出乎意料。因为，虽读过不少北大“三沈二马”的相关文献，但受“某籍某系”流言（抱怨上世纪20年代北大中文系里浙江人专权）影响，我想当然地认定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乃浙江人。当年他们在北京学界的交往及活动，确实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其实，周作人早就提到“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知堂回想录》第4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愿我读书不细。汉阴县的三沈纪念馆里，陈列着沈尹默手书《自述》，开篇就是：“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虽然日后移居原籍吴兴、讲学杭州乃至扬名北大，但沈尹默的国学根基以及书法造诣，是在汉阴这座陕南小城奠定根基的。

安康市汉阴县居汉水中上游，北依秦岭而南靠巴山，人口才30多万，经济上并不宽裕，竟大张旗鼓地筹建三沈纪念馆，并开展专门研究，这点很让我感动。纪念馆重建于三沈早年读书生活过的汉阴书院和江南会馆旧址，主展馆是江南庭院风格，正厅摆放着三位先生的汉白玉雕像，上悬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手书的“嘉惠士林”匾额。展品基本上都是复制品，但解说词写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另一个联大

提及“联大”，很多人想当然以为是特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不会意识到同时期还存在着另一个“联大”——那就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我应邀为张在军著《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写序，有这么一段话：“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2017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在我看来，今天表彰西北联大，不能仅限于打抱不平或颠倒时论，必须

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的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7月）；随着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各自独立门户。

西北联大之所以很快解体，政治因素及人事纠葛外，还涉及所在地物资供应能力，这是我当初阅读档案的感觉。抗战中众多大学内迁，既给西部地区带来了文化知识及先进技术，也给大学所在地民众增添了很多麻烦——最直接的便是物价飞涨。相比西南联大设在省会城市昆明，西北联大办在汉中城固县，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城固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名胜古迹甚多，但经济实力不行，直到2020年才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推想八十年前，因战争缘故，西北联大这么个临时组合且建制复杂的庞然大物突然涌入（四个学院在城固，另外两个分设附近的勉县与南郑），各种内在矛盾与外部摩擦难免避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属于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且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20年），保护内容包括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和大成殿建筑，都在城固县城，但分属三地。

午餐后，一到位于城固一中校内的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众人马上欢呼与惊叹。这是一座回字形两层阁楼，建于1914年，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中间花园立有“城固县立中学创办”小石碑，两边是学生及教师宿舍，陈放着几个刻着“西北大学”字样的木头柱子。旧址是整修过的，但此前长期作为城固一中教师宿舍使用，整体结构没有变动。陪同参观的主人之一因妻子在城固一中教书，也曾长期居住于此，告知孩子就在这里长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香港某大学。本地人都说，正因有西北联大的福佑，作为省级重点中学的城固一中，这些年走出了不少青年才俊。

告别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出县城，走高速，半个多小时后下高速，在崎岖不平的乡道上颠簸了一阵子，才来到古路坝村的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光绪十四年（1888年），意大利神甫安廷担任汉中教区主教，开始在此置地建堂，日后成为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抗战中被借用来办学，周边新建了好些学生宿舍。时过境迁，现仅存主教公馆及修女院残迹，前者也是回字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左右各十三间厢房，窗沿用汉白玉或青砖雕镂，天花板上绘有西洋画；后者因年久失修，只剩下残垣断壁，靠几根木柱坚强地支撑着。墙门上有“城固县古路小学”字样，配合周边的芳草萋萋，记录着生命沧桑，颇为摄人心魄。 □陈平原



语林指瑕

护法狮

年代：唐代
收藏单位：陕西华厦古代艺术博物馆

护法狮正襟危坐于莲台之上，昂首挺胸，头部微微右倾，胸部肌肉宽阔有力，十分健硕。前腿向前斜撑，造型庄严，神韵谨慎。腿部肌肉概括性总结为三大块，前足分为四趾，粗壮有力。狮子怒目圆睁，目视右前方，上下唇紧闭，犬牙外翻并有胡须三缕，头顶到脑后乃至后背都有左右对称卷曲呈螺旋状的鬃毛。整个护法狮精神抖擞，眼睛炯炯有神。莲台为正置和倒置两组莲花，中间装饰有宝相花。 □岳琳瑜

陕西瑰宝